

远涉重洋 教育救国

——容闳(1828—1912)

从鸦片战争前夕到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，中国由封建社会逐步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。无数优秀的中华儿女通过各种途径向西方学习，为救国救民而上下求索，奔走呼号。爱国华侨学者容闳就是其中的一员。从少年时代起，容闳就接受西方教育，成为中国最早的留美学生。回国后，他主张“教育救国”，建议派遣留学生到西方学习。后来他投入洋务运动和变法维新运动。晚年，他倾向革命，拥护民主。在他不断求索的一生中，他顺应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，为祖国的强盛作出了应有的贡献。在他的身上，体现着海外华人对祖国的赤诚之爱。

中国最早的留美学生

容闳，原名光照，号纯甫。1828年11月17日，出生

在广东省香山县（今广东中山）南屏乡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。

1835年，容闳进澳门传教士办的教会小学读书。1839年，学校因经费困难而停办，容闳只好返回家乡。两年后，他通过传教士霍白生的介绍，进入在澳门教会小学基础上重新开办的马礼逊学校读书。次年，随该校迁至香港。

在马礼逊学校里，容闳学习英文、地理、算术、几何等课程，接受了系统的科学教育和教会教育。他学习勤奋，成绩优异，深得美国传教士布朗的赏识。

1847年1月，在外国教会和香港英商的资助下，容闳与另两位同学随布朗夫妇远渡重洋，进入美国麻省孟松学校学习，开始了他在美国的留学生活。

容闳虽然自幼便接受西方文化教育，但他热爱自己的祖国，很早便发下宏愿，立志“他日竟学，无论何业，将择其最有益于中国者为之”。就在他即将从孟松学校毕业时，校方董事会提出，可以提供他上大学的奖学金，条件是毕业后必须回中国当传教士，并要求他在誓言书上签字。容闳断然拒绝了校董事会的条件，他说：“这将阻碍和限制我发挥自己的才能。我要有充分的行动自由，运用一切可能的机会，为中国的最大利益，贡献我的力量。”简单的几句话，表现了中华民族子孙应有的民族尊严和可贵的爱国心。

1850年，容闳以优秀的成绩，考入美国最负盛名的耶鲁大学。依靠美国一些社会团体和私人的资助，他半工半读，于1854年完成大学学业，成为第一个毕业于美国的中国留学生。

本来，容闳既已取得学位，又加入了美国国籍，完全可以在美国找一份好工作，过上安逸富裕的生活。但他忘不了多灾多难的祖国，他要“以西方之学术，灌输于中国，使中国日趋文明富强之境”。容闳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，就在毕业后一年毅然回国。

然而，腐朽反动的清王朝对这位毕业于美国大学的“洋”知识分子并不感兴趣，更谈不上重用了。为了谋生，容闳不得不四处奔波，数易其职。他先在广州美国驻华公使伯驾处任书记，后又到香港高等审判厅任翻译，接着又转到上海海关翻译处任职。

这期间，他目睹海关和洋商营私舞弊，互相勾结，损害中国的利益以饱私囊，感到十分愤慨。有一天，他问上海海关税务司的英国人李泰国：“如果我一直在海关任职，有没有晋升为税务司的希望？”李泰国耸耸肩，说：“不论是你或者是任何别的中国人，都不可能有一种希望！”

容闳听后，十分气愤。他觉得这不仅是对他个人的侮辱，而且是对全中国人的侮辱。尽管海关薪金优厚，他还是辞去了这一职位。他曾这样写道：

人生在世并不仅仅是为了图动物般的生存而含辛茹苦，我曾勤奋不懈使我受到教育，我感到我应该把我所学到的一点知识作出最大的贡献，不是为了我个人的利益，而是为了造福于整个中华民族。

教育救国

还在留美时，容闳有感于祖国的落后和危机，便开始思索救国方略。他首先考虑的是如何造就一批从事改革和现代化的人才，认为使中国的年轻一代获得先进的西方科学技术十分重要。由此，他萌生了教育救国的思想。

在以后的漫长岁月里，容闳四处奔走呼号，寻找一切机会，实施他的教育救国计划。

1860年11月18日，容闳来到太平天国首都天京（今南京），抱着通过太平天国推行自己改革方案的期望，向洪仁玕提出了七条改革建议，就政治、军事、经济、文教等方面提出了初步的改革方案。内容包括：模仿西方创办银行和制定度量衡标准；按西方国家标准组织军队，培养军官；设立海军学校；颁定各级学校教育制度；设立各种实业学校等。

很显然，对于这个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方案，太平天国难以认同，更不用说采纳了。失望之余，容闳把目光转向洋务派。1862年夏，他面见洋务派头面人物曾国藩，试图通过曾国藩等人来实现自己的教育计划。

1864年初，为筹建制造局，容闳奉曾国藩之命，赴美购买机器，次年购回各类机器一百多种。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引进外国的先进机器设备，其意义非同寻常。

1867年春，已是清朝五品候补同知的容闳，向清政府

呈上《拟议联设新轮船公司章程》，倡议由中国人自己筹办一家轮船公司。《章程》提出，轮船公司在集股、管理、分红等方面，仿效西方企业的经营方式，全部由民间集资开办，以自由竞争的精神发展中国自己的轮船航运业，促成沿海和内地的通商，打破外国人垄断中国航运业的局面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。

1868年，容闳在通过丁日昌转呈总署的条陈中，重提组建华商轮船公司的主张，并进一步要求承担漕运。虽然清政府没采纳上述建议，但1873年轮船招商局的开办，与此不无关系。

不久，曾国藩视察洋务运动的重要工业基地江南制造局。容闳乘机提出，在江南制造局附设机械学校。按照他的设想，在这所学校里，一批中国青年接受了机械工程学理论和实践的教育。这使中国免于雇佣外国机械工程师。机械学校的创办，为中国培养了一批早期的熟练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。

容闳之所以提出上述办校建议，在于他不仅考虑到引进先进设备必须同时引进相应的科学技术，更考虑到要运用教育的手段为实行独立自主的方针服务。

1868年，容闳第一次向清政府陈述酝酿将近十年的留学生计划，但未被采纳。1870年，他又旧事重奏，于次年终被清政府批准。

不久，清政府在美国设立中国留学生事务所，任命陈兰彬和容闳为正、副监督，并制订了派遣留学生的计划：分期分批选拔优秀青少年到美国留学，名额为一百二十人，分四

期，每年一期，每期三十人，逐年分送出洋。

当时，社会风气依旧封闭、落后，大多数人仍以科举考试为升官发财的唯一途径，视出国留学为“放逐”，谁也不肯轻易送子女出国。容闳费尽了心机，好不容易才招齐了三十名学生。

1872年8月，第一期留学生赴美。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批官费留学生，开了中国大批派遣留学生之先河。

1875年12月，容闳被任命为驻美国、西班牙、秘鲁三国副公使。但他对当官并不感兴趣，教育才是他要终生为之奋斗的事业，他依然致力于他的教育救国计划。按照他的计划，这批官费留美的少年，应该在大洋彼岸全面学习西方的科学知识和社会政治思想，以便将来服务于中国的改造和建设。但是，当时的清王朝依旧坚持提倡写八股文，开科取士。于是，新旧两种思想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冲突，其结果是，1881年清政府下令撤销幼童出洋毕业局，召回留美学生。容闳寄予厚望并苦心经营的留学生教育计划夭折了，这使他极为失望。

容闳在参与洋务运动的近二十年里，除致力于教育事业外，还做了许多利国利民的事。1874年8、9月间，容闳秘密前往秘鲁，调查华工情况，精心收集了大量华工受迫害的证词、证据和文件，迫使秘鲁政府不得不承认迫害华工的事实，并在照会中保证要“实力保护华工”。1878年，美国同孚洋行为秘鲁拐运华工。案发后，容闳会同陈兰彬照会美国，提出强烈抗议。他的这些外交活动，完全站在爱国的正义立场上，坚决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利益。

留学生计划横遭摧残后，容闳失望之余，退出洋务运动，一直寓居美国。

与时代同步

甲午战争中，腐朽的清王朝一败再败，割地赔款，卖国求荣。远在大洋彼岸的容闳拍案而起，于1895年再次回国，希冀在花甲之年，能为祖国尽一分力。在北京，他结识了梁启超和康有为，开始参与维新运动。他在京的寓所，一度成为维新党领袖的聚会之处。

1898年，戊戌变法失败，六君子被害，容闳被迫逃往上海。此次失败，并没有使他丧失对中国必然要走向进步的信念，相反，他彻底打消了对清王朝的幻想，从而在思想上逐步从赞成改革转为同情革命。

1900年9月，在赴日本的轮船上，容闳巧遇孙中山。在这以前，他们两人是“只闻其名，未见其人”，此番巧遇，大有相见恨晚之慨。自此，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

不久，容闳参与了谢纘泰等人谋划的兴中会第二次起义。1908年12月，容闳写信给美国友人、军事学家荷马·李，要求他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。他自己则在美国竭力为孙中山进行宣传，出谋划策，寻求美国人民的援助，以实现其推翻清王朝的革命理想。翌年底，容闳在美国又一次会晤孙中山，提出了一个名为“红龙中国”的起义计划。

南京政府成立前夕，孙中山致电容闳，希望他归国投身

民国建设。当时，容闳已病重卧床，无法成行。临终前，他还再三叮嘱两个儿子说：“吾费如许金钱，养成汝辈人材，原冀回报祖国。”其报效祖国的热忱至死不减。

容闳一生始终与历史潮流同步，至死心向祖国。为了拯救落后的中国，他百折不挠，追求真理，其爱国思想和实践，永远值得后人怀念。

容闳的友人特韦契耳曾讲过一段话，可以看作对容闳最中肯的评价：

他从头到脚，身上每一根神经纤维都是爱国的。他热爱中国，信赖中国，确信中国会有灿烂的前程，配得上它的壮丽的山河和伟大的历史。